

從類型學視角看絲綢之路沿線語言的並列連詞

陳健榮*、李晨萱

香港樹仁大學

提要

實詞如何透過語法化獲得並列連詞功能，是語言類型學一直關注的課題，近年亦有不少學者從跨語言比較的視角，探討並列連詞語法化的共性。本研究基於 2010 至 2025 年間的田野調查，收集了分屬 426 種語言及 367 種漢語方言的 1533 個並列連詞，旨在分析絲綢之路沿線語言並列連詞的語法特徵與語法化路徑。本文有兩點發現。第一，絲路語言的並列連詞語法化路徑可分為“共同施事型”與“共同受事型”：循“共同施事型”路徑語法化的伴隨標記，傾向於連接有生名詞；循“共同受事型”路徑語法化的伴隨標記，傾向於連接無生名詞。第二，絲路語言的並列連詞多與數詞同形，據此可分為“以一為和”及“以二為和”兩型。前者與數詞“一”同形，例如格魯吉亞語的 *-dan ertad*、維吾爾語的 *bilan* 等；後者與數詞“二”同形，例如甘肅及青海地區東鄉語的 *guala* 以及部分甘青地區漢語方言中的“倆”、“兩個”等。本研究揭示絲路沿線語言連詞的多樣性，為語言類型學研究提供寶貴資料與新的啟示。

關鍵詞

並列連詞，共同施事，共同受事，類型學，語法化

* 陳健榮為本文通訊作者。

© 2026 陳健榮、李晨萱。本文根據 Creative Commons 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 禁止改作 4.0 國際協議授權。

1. 並列連詞研究概述

1.1. 從類型學視角看並列連詞

並列連詞作為普遍存在的語法範疇，向為語言學界所關注。現代並列連詞研究可追溯至二十世紀中期 Chomsky (1957, 1969) 的工作，其後 Dik (1968) 等學者進一步深化了理論探討。至二十世紀後期，Traugott (1986) 等將研究重心轉向歷時探源。進入二十一世紀，Mithun (1988)、Drellishak (2004)、Haspelmath (2004)、Zwart (2005) 及 Stassen (2008) 等學者的類型學研究，致力於通過大規模跨語言調查歸納共性並構建分類。然而，既有研究仍有不足之處，例如部分研究過度依賴二手數據、分析標準尚欠統一，以及對特定語言（如漢語及其方言）的詮釋未盡周全等。以 Haspelmath (2007: 36) 為例，該文援引 Matthews 和 Yip (1994: 289) 的語料，將香港粵語的“都”歸為總括連詞 (summary conjunction)。然而，“都”字句可不受並列結構限制 (Coordinate Structure Constraint, Ross 1967) 約束，故“都”不宜視作嚴格意義上的並列連詞：

- (1) a. 印花費、律師費、經紀佣都要俾嘅。
- b. 印花費、律師費、經紀佣其實都要俾嘅。

此外，當前的跨語言數據庫於絲綢之路沿線，尤其是中亞地區，其數據覆蓋亦有待完善。例如，在 Grambank 數據庫 (Skirgård et al. 2023) 中，與並列連詞相關的特徵 GB027 在中亞地區的調查點，便明顯少於其他區域：

圖 1 並列連詞與伴隨標記同形語言分布 (Grambank 特徵 GB027)



特徵 GB027 共收錄 2,421 種語言，其中 713 種語言的並列連詞與伴隨標記同形（見上圖深色圓點），1,065 種語言的兩者不同形（見上圖淺色圓點），另有 643 種語言的對應關係未有明確記錄（見上圖三角形）。儘管 Grambank 收錄語言數量龐大，其於絲路地區卻存在顯著的數據空白。¹

有鑒於此，我們亟需補充絲路地區的一手語料，深入記錄並分析其並列連詞的特點，並結合類型學理論，以揭示該區域內語言的共性與個性。

1.2. 並列連詞的語法化

並列連詞的歷時來源與語法化路徑，是語言類型學研究的核心課題之一。Traugott（1986）透過跨語言調查，歸納出並列連詞的六大來源：

表 1 並列連詞來源

並列連詞來源	例子
1. 線性方位 / 時序關係詞（如：前、後）	印歐語 * <i>hanti</i> , <i>hant-</i> （表“在前”義） > 古撒克遜語 <i>ant-</i> > 英語 <i>and</i> （連詞）
2. 附加義助詞（如：也、都）	印歐語 * <i>eti</i> （表“也、都”義） > 拉丁語 <i>et</i> （連詞）
3. 篇章連接助詞、副詞（如：除此以外、而且）	Mohawk 語 <i>tahnu</i> （副詞“除此以外” > 並列連詞）
4. 伴隨標記	Sarcee 語 <i>mih</i> （伴隨標記 > 並列連詞）
5. “去、帶”義動詞	Hdi 語 <i>là</i> （動詞“去” > 連詞）
6. 代名詞	印歐語 * <i>tó</i> > Hittite 語 <i>ta</i> （連詞）

然而，由於多數語言缺乏足夠的歷史文獻佐證，完整重構其演變路徑極為困難。儘管如此，語言學家發現，通過分析共時層面的一詞多義模式（polysemy），仍可推斷歷時演變的軌跡。誠如張敏（2015: 9）所言：

某個語法形式若具有多重意義 / 用法，而這些意義 / 用法在不同語言裡一再出現以同一個形式負載的現象，則其間的關聯絕非偶然，應是有系統的，普遍的，可能反映了人類語言在概念層面的一些共性。

此方法的理論基礎在於語法化的內在機制，特別是 Hopper（1991: 3）所提出的“分散原則”（Principle of Divergence）。

¹ 另一跨語言數據庫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WALS.org, Dryer & Haspelmath 2013）中，特徵 63A 採用與 Grambank 特徵 GB027 相近的分類標準，其在絲路地區的語料覆蓋同樣有所不足。

石定栩、韓巍峰（2013）對此亦有闡述：“在某一語言形式的語法化過程中，原有的用法並不一定會完全消失，相反，新生的用法與原來的用法可以共生”。此類詞義分化與共存的現象十分普遍。例如，英語動詞 *have* 既可作實義動詞，亦可作助動詞。同樣地，粵語的“同”自十九世紀起逐步語法化為介詞與連詞，但其動詞用法至今仍保留（陳健榮 2008；Chan 2020）。

因此，這種跨語言反覆出現的一詞多義模式，為研究者提供了構擬並列連詞語法化路徑、揭示語言演變普遍規律的重要線索。

1.3. 從“伴隨”到“並列”

在 Traugott（1986）提出的六類來源中，由伴隨標記語法化為並列連詞的路徑，尤為學界所關注。伴隨與並列兩個概念在語義上緊密關聯，但在句法結構上存在顯著差異：伴隨關係體現為不對稱結構，而並列關係則體現為對稱結構。茲比較以下二例：

(2) John will travel to China with Peter.（約翰會跟彼得去中國。）

(3) John and Peter will travel to China.（約翰和彼得會去中國。）

語義上，（2）與（3）所描述的事件基本相同。然而，在句法結構上，二者涇渭分明：句（2）的 *John* 充當主語，而 *Peter* 則由前置詞 *with* 引入，構成介詞短語，二者句法地位不對等。句（3）中，*John* 與 *Peter* 則通過連詞 *and* 連接，共同充當主語，句法地位較為對稱。² 基於此項差異，Stassen（2000）提出一套類型學分類，將世界語言分為 AND- 語言與 WITH- 語言。前者採用不同的形式分別表達伴隨與並列關係；後者則以同一形式兼表伴隨和名詞性成分並列（noun phrase coordination）的功能。³

1.4. 鄰接假說（Adjacency Hypothesis）的提出與修正

據 WALS 數據庫統計，在 234 種被調查語言中，有 103 種屬於 WITH- 語言。此現象跨語系普遍存在，足見其並非偶然。為解釋此分布，Stassen（2008）指出，WITH/AND 語言的類型劃分與格－時（Case-Tense）系統相關：具備格－時系統的語言傾向於成為 AND- 語言，反之則傾向於成為 WITH- 語言。然而，Stassen（2008:

² 此處的“對稱”是相對伴隨關係而言的。嚴格來說，並列結構在句法上並非完全對稱。並列結構如“John and Peter”可分析為 [John [and Peter]] 的層級結構，其中 *John* 為外並連語（external conjunct），*Peter* 為內並連語（internal conjunct）。

³ WITH- 語言還可進一步分為“純粹型”（pure）與“混合型”（mixed）。純粹型完全不設並列標記，混合型則以同一形式標記並列與伴隨關係。因純粹型 WITH- 語言並非本文的研究對象，故本文所指的 WITH- 語言，均為混合型。

803) 本人亦坦言此僅為“傾向而非普遍規律”，且對格－時系統與 WITH/AND 策略選擇之間的內在關聯，Stassen 並未詳加闡釋。

劉丹青 (2003) 的研究為此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他指出，一種語言的介詞與連詞在語序位置上常呈一致性：前置詞語言傾向於使用前置連詞（如漢語、英語），後置詞語言則傾向於使用後置連詞（如日語）。吳福祥 (2003) 據此提出“優勢語序論”，將伴隨與並列策略的選擇直接關聯於語序。S[PO]VO 語序，⁴ 使得伴隨介詞常出現於主語和共同施事者之間，從而為其重新分析為並列連詞創造了句法條件。此論點闡明了 WITH- 語言形成的句法機制，較 Stassen (2008) 的“格－時標記”論更具解釋力。

然而，陳健榮 (2018) 的後續研究對此提出了挑戰。其對 29 種 WITH- 語言的考察顯示，“優勢語序論”僅能解釋其中 6 種。某些不具備此“優勢語序”的語言（如 Nkore-Kiga 語，其伴隨標記並不位於主語與伴隨名詞之間），⁵ 亦演化為 WITH- 語言。為此，陳健榮 (2018) 對語序論進行了修正，指出關鍵在於“鄰接”：只要伴隨標記位於兩個名詞性成分（主語或賓語）之間，即具備語法化為並列連詞的潛力。在此基礎上，Chan (2020: 488) 擴大數據樣本，正式提出“鄰接假說” (Adjacency Hypothesis)：

已知 X 兼有伴隨標記及並列連詞兩種功能：

假如並列結構為 [NP₁-X-NP₂]，當 X 作為伴隨標記時，必然位於兩個名詞性成分（可以是主語或賓語）之間；

而假如並列結構為 [NP₁-X-NP₂]，當 X 作為伴隨標記時，則必然位於兩個名詞性成分（可以是主語或賓語）之後。

為驗證此假說，Chan (2020) 對 160 種語言的調查顯示，“鄰接假說”的解釋率高達 98.8%（適用於 158 種語言），而吳福祥 (2003) 的“優勢語序論”解釋率則為 60.0%（適用於 96 種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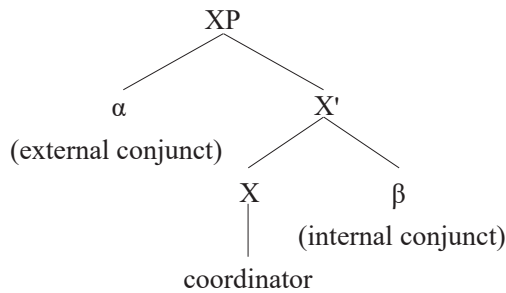
鄰接假說”有四點重要理論啟示：一，[伴隨 > 並列] 語法化的觸發條件為表層句法結構的鄰接，而非深層結構，如“我和張三吃飯”的表層鄰接為“和”的語法化提供條件；二，鄰接是該語法化的必要條件，介詞短語不與主 / 賓鄰接則無法啟動此路徑；三，直賓與介詞短語的鄰接也能促成語法化，此點為前人忽略；四，假說適用於後置式並列結構（如青海西寧方言的 [AB 倆]），彰顯其理論普適性。

⁴ 本文所有語序描述中，均以 S、V、O 代表主語、謂語動詞及賓語。至於介詞短語則標為 [PO] 或 [OP]。

⁵ 這類語序又稱為“分裂式結構” (split construction)。

此外，該假說與 Munn (1987)、Zhang (2006) 的內外並連語理論高度契合，該理論認為並列結構 $[\alpha X \beta]$ 為層級結構 $[\alpha [X \beta]]$ ， β （內並連語）先與 X 組成 X' ，再與 α （外並連語）組成 XP 。如下圖所示（Zhang 2006: 190）：

圖 2 並列層級結構



鄰接假說正好為此分析提供了歷時動因：在表層結構中直接相鄰的 $[NP_1 [X NP_2]]$ ，具備了被重新分析為並列結構 $[\alpha [X \beta]]$ 的句法條件。

本文以絲路沿線語言一手資料，檢驗語法化理論解釋力、探索新演變路徑。第二章說明語料庫結構與調查分析方法；第三章探討伴隨標記語法化為並列連詞的路徑，結合“鄰接假說”分析其在絲路語言的分布特徵，檢驗理論適用性；第四章突破 Traugott (1986) 框架，探討數（量）詞語法化為並列連詞的現象，據吳福祥、金小棟（2021）比較漢語與周邊語言異同，論證該現象非偶然；第五章總結全文，闡述本研究對理論的檢驗與修正，及絲路語料對類型學研究的啟發與貢獻。

2. 絲綢之路的並列連詞研究

2.1. 跨語言並列連詞數據庫的建立

本研究構建了一個跨語言並列連詞數據庫，數據來源有二：一是 2010 至 2020 年間的田野調查，二是對既有文獻的系統梳理。一手數據通過問卷與訪談收集：問卷含 38 組附圖例句，用以記錄並列連詞與伴隨標記的語音形式及語序特徵；後續訪談則深入探討一詞多義模式及句法限制，共訪談 353 位發音人。經整理，共收錄 34 種漢語方言及 45 種語言的一手數據。文獻方面，梳理 830 篇學術文獻，提取 254 個漢語方言點及 102 種語言的相關數據。數據庫總計收錄 1533 個並列連詞（一手數據 645 個，文獻數據 888 個），涵蓋亞非、南島、印歐、尼日爾－剛果、漢藏、跨紐幾內亞等六大語系的 426 種語言及 367 種漢語方言。

本研究於 2023 至 2025 年間，對甘肅地區進行了田野調查，調查點包括蘭州（紅古、夏官營）、天水（武山、秦安、甘谷）、白銀（會寧、靖遠）、平涼（靜寧）、臨夏回族自治州、積石山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自治縣及東鄉族自治縣的漢語方言。此階段採用與前期一致的調查方法，共訪談 91 位發音人。本研究採用張敏（2015: 23）提出的“自下而上”（Bottom-up）模式。從漢語方言入手，逐步擴展至區域方言、全國方言，再納入漢藏語及其他世界語言。該方法具有兩方面優勢：首先，從研究者熟悉的母語出發，再引入非漢語數據驗證，使所得蘊涵規律更為精確；其次，能夠充分呈現漢語內部的複雜多樣性，彌補西方類型學研究中常將漢語視為相對同質系統（如 WALS 僅收錄 10 個漢語方言點）的不足。本文主要研究對象為絲路沿線地區語言，並在“絲綢之路”的定義上採取較寬鬆的標準。本研究的“絲綢之路”指陸上絲綢之路，包括以下區域：（一）中國陝西、甘肅、青海及新疆地區；（二）中亞地區，包括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三）南亞地區，包括印度、伊朗和阿富汗；（四）西亞地區，包括伊拉克、敘利亞及土耳其。然而，當代一帶一路倡議涉及的國家範圍更廣，故暫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2.2. 並列連詞與伴隨介詞的區分

在漢語等諸多 WITH- 語言中，形式上兼表伴隨與並列功能的詞（如“和”）其詞性界定常有歧義。為確保分析的精確性與一致性，本研究參照 Haspelmath（2016）的原型理論（prototype model），並採用一套嚴格的句法及語義判斷標準，以區分一個形式（X）的伴隨介詞功能與並列連詞功能。即便找到同一句子中 X 同時具有介詞和連詞的解讀，都不能斷言 X 兼有介詞及連詞功能。本文主要採用以下兩組判斷標準：

(I) 介詞功能測試

如果 X 能出現在違反並列結構限制（Coordinate Structure Constraint，下稱 CSC）的句子中，則只能解讀為介詞。按照 Ross（1967: 158）的描述，並列結構中任何成分均不能移位。⁶ 例如：

- (4) *What sofa will he put the chair between [some table and *t*]? (Ross 1967: 158)
- (5) a. 張三喜歡 [李四和王五]。
b. * 王五嘛，張三喜歡 [李四和 *t*]。
c. * 李四嘛，張三喜歡 [*t* 和王五]。

⁶ 原文為：“...in a coordinate structure, no conjunct may be moved, nor may any element contained in a conjunct be moved out of that conjunct.”

英語連詞 *and* 連接的名詞，不能移出並列結構。因此（4）不合法。漢語亦然，句（5）的“李四和王五”屬並列結構，因此“李四”及“王五”均不能話題化。

本文主要以 CSC 為核心標準，以否定句為輔助，判斷 X 是否具有介詞功能。從句法角度看，如果 X 能與相鄰的名詞性成分隔開，便不算是連詞；從語義角度看，如果 [主語 + 動作] 與 [伴隨賓語 + 動作] 的真值可以相反，X 便不算是連詞。例如“張三不和李四去上海”中，主語“張三”和介詞短語“和李四”被否定詞“不”隔開，且“張三去上海”與“李四去上海”的真值可以相反，因此證明漢語“和”具有伴隨介詞功能。

(II) 連詞功能測試

如果 X 構成的句子不能違反 CSC，則只能解讀為連詞。從句法角度看，介賓短語和主語不能被否定詞隔開；從語義角度看，[主語 + 動作] 與 [伴隨賓語 + 動作] 的真值相同。例如“張三和李四是上海人”中，“張三”和“和李四”不能被否定詞“不”隔開（*張三不和李四是上海人），且“張三是上海人”與“李四是上海人”的真值相同，證明漢語“和”具有並列連詞功能。

針對漢語方言，本研究引入楊萌萌、胡建華（2017, 2018）提出的“主賓不對稱”作為輔助診斷標準：若形式 X 可連接賓語位置的兩個名詞（如“張三喜歡咖啡和牛奶”），則可確認其連詞功能。鑒於此現象並非跨語言之普遍規律，在調查所有語言時，均系統考察主語與賓語兩個位置上的並列現象。為確保數據一致性，凡二手文獻未提供足以支持上述判斷測試的語境或例句，其數據均不予採納。

3. “共同施事型”與“共同受事型”並列連詞

3.1. “伴隨格”的再分類

本文 1.3 節提到，傳統觀點認為“伴隨標記”⁷的語法化可以獲得並列連詞的功能，而且傾向連接名詞。在語法化的過程中，原有的“伴隨標記”功能往往得以保留，因此出現同一語法形式兼有伴隨和並列兩種功能的現象。

陳健榮（2018）將“伴隨標記”分成“共同施事標記”（Co-agent marker）與“共同受事標記”（Co-patient marker）兩類。“共同施事標記”引介共同施事者，與施事者（一般是句子的主語）一起執行謂語動作。而“共同受事標記”則引介共同受事者，與受事者（一般是句子的直接賓語）一樣，均為謂語事件的受事者。在句法上，兩者

⁷ 包括伴隨介詞（前置詞和後置詞）以及格標記。

同屬伴隨介詞，與賓語組成介詞短語。然而，在語義角色為共同施事時，介賓短語修飾的是動詞短語；而當語義角色為共同受事時，介詞短語修飾的卻是名詞短語。例如在（6）中，介詞短語 *with John* 修飾的是 *drink coffee*，而句（7）的介詞短語 *with milk* 修飾的是 *coffee*：

- (6) I_{NP} [[drink coffee]_{VP} [with John.]_{PP}]_{VP} (我跟約翰喝咖啡。)
(7) I_{NP} [[drink]_{VP} [coffee [with milk.]_{PP}]_{NP}]_{VP} (我喝加了奶的咖啡。)

為方便行文及理解，本文統一使用“施事者”、“共同施事者”、“受事者”、“共同受事者”四個術語，簡述如下：

表 2 “施事者”、“共同施事者”、“受事者”、“共同受事者”特徵列表

語義角色	典型句子成分	例子
施事者 (Agent)	主語	<u>John</u> drinks coffee with Peter.
共同施事者 (Co-agent)	介詞短語中的賓語	John drinks coffee with <u>Peter</u> .
受事者 (Patient)	直接賓語	John drinks <u>coffee</u> with milk.
共同受事者 (Co-patient)	介詞短語中的賓語	John drinks coffee with <u>milk</u> .

應該注意的是：不是所有語言都能兼有“共同施事標記”與“共同受事標記”。以英語及漢語為對比：

- (8) a. I drink coffee with John.
b. 我跟約翰喝咖啡。
(9) a. I drink coffee with milk.
b. 我喝加了牛奶的咖啡。 / # 我喝咖啡跟牛奶。 / * 我跟牛奶喝咖啡。

英語伴隨介詞 *with* 在（8a）中引介共同施事者 *John*，在（9a）中則引介共同受事者 *milk*，兼具兩重功能。此現象在印歐語中頗為普遍，亦有諸多語言二者不同形，如漢語“跟”雖與 *with* 對應，卻僅具共同施事功能，無法引介共同受事者。故（8b）漢譯可用“跟”，（9b）則不可；漢語伴隨介詞短語置動詞前時，“我跟牛奶喝咖啡”不合法，置動詞後的我“喝咖啡跟牛奶”語義偏差，需以“喝加了牛奶的咖啡”等策略表達（9a）原意。更關鍵的是，（9a）的 *coffee with milk* 可違反 CSC，（9b）的“咖啡跟牛奶”則不可，可見 *with* 是共同受事標記，而“跟”是並列連詞。

- (10) I want a coffee, but not with milk. (我要咖啡，但是不要加奶。)
(11) * 我喝咖啡，但是不跟牛奶。

“共同施事標記”與“共同受事標記”呈現出鏡像關係，如下表所示：

表 3 “共同施事標記”與“共同受事標記”之鏡像對比

	共同施事標記	共同受事標記
例子	漢語及其方言、東干語、阿壩藏族羌語、斯拉夫語、印尼語、Chemehuevi 語、Bikele 語等	維吾爾語、烏茲別克語、越南語、老撾語、毛伊語、韓語、泰盧固語等
語法化路徑	共同施事 > 有生並列 > 名詞並列	共同受事 > 無生並列 > 名詞並列
語序特徵	介詞短語與主語鄰接 (例如 S[PO]VO ; S[OP]OV)	介詞短語與直接賓語鄰接 (例如 SVO[PO] ; S[OP]OV)
並列連詞特徵	傾向於主語位置，連接有生名詞	傾向於直接賓語位置，連接無生名詞
主賓不對稱模式	於賓語位置連接兩個名詞時，必須遵從 CSC	於主語位置連接兩個名詞時，必須遵從 CSC

第一，共同施事、受事標記的語法化路徑相異（陳健榮 2018）。前者初獲並列連詞功能時，多連接有生名詞；後者則連接無生名詞，二者進一步虛化後，對連接項的限制皆減弱。第二，共同施事標記語法化，需介賓短語與主語鄰接；共同受事標記則需介賓短語與直接賓語鄰接。第三，二者初獲並列連詞功能時均有語法位置限制，前者傾於主語位連有生名詞，後者傾於直接賓語位連無生名詞，進一步虛化後該限制減弱。第四，本文以楊萌萌、胡建華（2017, 2018）為基礎，證明漢語亦適用“主賓不對稱”，且分為施、受事標記兩類鏡像模式。源於施事標記者，於直接賓語位連名詞須遵 CSC，主語位可違；源於受事標記者，於直接賓語位連名詞無須遵 CSC，亦不可違。

兩類標記遍布世界各地區語系，數量相若。Chan（2020）統計，160 個並列連詞中 96 個源自共同施事標記，54 個源自共同受事標記，且同一語言可兼具兩類語法化。例如湘西龍山土家語（陳健榮、向華武 2022），兼有共同受事標記 *nie* 與共同施事標記 *taxa*。*nie* 作後置詞表伴隨時僅引介共同受事，作並列連詞則傾向連接兩個無生名詞，形成 [NP₁-*nie* NP₂] 結構，且與前文名詞在句法、韻律上緊密：句法上 NP₁-*nie* 修飾 NP₂，並列結構中 NP₁ 為內並連語、NP₂ 為外並連語；韻律上兩者都停頓僅在 *nie* 與 NP₂ 之間。

土家語的 *taxa* 剛好與 *nie* 相反。作後置詞，並表達伴隨關係時，*taxa* 傾向引介共同施事者。作並列連詞時，亦傾向連接兩個有生名詞。無論是後置詞還是並列連詞，形成的結構都是 [NP₁ NP₂-*taxa*]。句法上，NP₂-*taxa* 構成介詞短語，修飾 NP₂。並列結構 [NP₁ NP₂-*taxa*] 中，NP₂ 是內並連語，NP₁ 是外並連語：

- (12) *ko³⁵ nie²¹ eiau²¹ tsan²¹ kha²¹ fei²¹ xu²¹ tha²¹.

他 NIE 小張 咖啡 喝 不

他不跟小張喝咖啡。

- (13) ko³⁵ eiau²¹ tsan²¹ ta⁵³ xa²¹ kha²¹ fei²¹ xu²¹ tha²¹.

他 小張 TAXA 咖啡 喝 不

他不跟小張喝咖啡。

從以上兩句可見，*taxa* 可以引介共同施事者，*nie* 則不能。但是，*nie* 可以引介共同受事者：

- (14) ŋa³⁵ niu²¹ nai²¹ nie²¹ kha²¹ fei²¹ xu²¹.

我 牛奶 NIE 咖啡 喝

我喝加了牛奶的咖啡。（一種飲料）/ 我喝牛奶和咖啡。（兩種飲料）

土家語 *nie* 和 *taxa* 帶來重要啟示：即便介賓短語同時與主語、直接賓語鄰接，仍可憑並列結構語序及並列名詞有生度，判斷並列連詞來源。以 OV 型 / 後置詞語言（如日語、韓語，典型語序 S[OP]OV）為例：當發現並列連詞與伴隨標記同形時：如果並列結構為 [NP₁ NP₂-&]，且並列結構傾向連接有生名詞，我們就可以推斷連詞來自“共同施事標記”；而如果並列結構為 [NP₁-& NP₂]，且並列結構傾向連接無生名詞，我們就可以推斷連詞來自“共同受事標記”。

3.2. 絲路沿線語言的“共同施事標記”

通過對絲綢之路語言的考察，我們發現“共同施事標記”和“共同受事標記”都能語法化為並列連詞，這與 Chan（2020）提出的類型學概貌相符。同時，我們也沒有找到鄰接假說的反例。

首先，我們將介紹絲綢之路語料中，由“共同施事標記”語法化而來的並列連詞。這些語言呈現出兩種主要的語序類型：第一類是 S[OP]OV 型語序，相應的並列結構為 [AB&]，主要分布在非漢語及甘肅－青海地區的漢語方言中。例如青海西寧“倆”及甘肅臨夏的“兩個”：

- (15) 青海西寧：

阿哥倆當兩口兒哩。（也要和哥哥結為夫妻。）

（都興宙 1995: 56）

- (16) 甘肅臨夏：

我、尕張、尕高兩個一噠去。（我、小張、小高一起去。）

（田野調查所得）

句(15)的主語則沒有出現,可見“阿哥”與“倆”組合成介詞短語,此句的“倆”是共同施事標記而非並列連詞。而(16)的“兩個”則連接“我、尕張、尕高”三個名詞,而且不能違反CSC,因此屬於並列連詞,而非同位語或介詞。

第二類是S[PO]VO型語序,相應的並列結構為[A&B],主要分布在漢語和東干語中。以東干語的“連”/liã²⁴/為例:

(17) 天天連我他睡的戱前拉磨的呢。(他天天睡覺之前和我閒聊着呢。)(林濤 2007: 98)

(18) 我姐姐連我念書的呢。(我姐姐跟我在念書。)(林濤 2007: 107)

句(17)的主語則沒有出現,“連”屬於共同施事標記,與“我”組合成介詞短語。而(18)的“連”則連接“我姐姐”與“我”,三者組合成[A&B]並列結構。總括來看,兩類情況中主語與介詞短語總是鄰接的,語序結構符合鄰接假說。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語序類型如何,主語與介詞短語始終保持鄰接。進一步分析顯示:S[OP]OV語言的並列結構均為[AB&],S[PO]VO語言則均為[A&B],這表明共同施事標記語法化為並列連詞的過程,發生在[主語+介詞短語]結構中。兩點證據進一步佐證:其一,“共同施事標記”語法化而來的連詞皆遵“有生>無生”的蘊含關係,能連接無生名詞則必能連接有生名詞,反之則否;其二,部分語言的此類連詞雖可連接各類名詞,卻僅能在主語位置連接,目前未發現專門在賓語位置連接的情況。總之,絲綢之路語言的語料分析表明,共同施事標記可語法化為並列連詞,且其語法化路徑與語序類型密切相關。

另外,我們亦發現青海西寧漢語方言兼有後置連詞“倆”/lia⁵³/和居中連詞“帶”/tai²¹³/。前者可參考例句(15)、(16),後者例句如下:

(19) 小王不帶小高去西寧。

(20) 小王帶小高都是西寧人。

句(19)的“帶小高”與主語“小王”被否定詞“不”隔開,因此只能判斷為共同施事標記而非並列連詞。而(20)的“小王帶小高”則不能違反CSC,所以屬於並列連詞。與土家語的*taxa*和*nie*不同,青海西寧的“帶”和“倆”都是從共同施事標記虛化而來的。這是因為“帶”作共同施事標記時,語序為S[PO]VO。“倆”則是S[OP]VO。一方面,反映當地VO型漢語方言受OV型非漢語影響,出現語序演變,後置詞種類及使用頻率增加,甚至逐漸發展成格標記(見Peyraube 2017等)。另一方面,“帶”和“倆”的發現為Chan(2020)的鄰接假說提供有力論據。說明[伴隨>並列]的語

法化與表層結構的語序高度相關。導致前置詞“帶”虛化成居中連詞，而後置詞“倆”則虛化成後置連詞。

絲路中有 26 個兼作並列連詞的共同施事標記，詳列如下：

表 4 絲路語言中的共同施事標記

語言 / 方言	伴隨 - 並列標記 ⁸	主要語序	並列結構 ⁹	參考來源 ¹⁰	可連接成分
雅庫特語	nnn	S[OP]V	AB&	Stassen (2008)	有生名詞
阿壩羌語	ŋa	S[OP]OV	AB& / A&B	孫宏開 (1981) ; 黃布凡、周發成 (2006)	有生名詞
東干語	liã ²⁴	S[PO]VO	A&B	林濤 (2007)	有生名詞
寧夏靈武市郝家橋 - 漢語蘭銀官話	xɣ ⁵¹ ; liã ⁵¹ ; ken ⁵⁵	S[PO]VO	A&B	F102	所有名詞
甘肅會寧甘溝鎮修岔村李東社 - 漢語中原官話	lia ²¹	S[PO]VO	A&B	F103	有生名詞
甘肅天水 - 漢語中原官話	liã ¹³	S[PO]VO	A&B	F061	所有名詞
甘肅蘭州 - 漢語蘭銀官話	kən ⁵³ ; xɣ ⁵¹	S[PO]VO	A&B	F062	所有名詞
甘肅定西 (城區) - 漢語中原官話	le ²³	S[PO]VO	A&B	F076	所有名詞
甘肅蘭州皋蘭 (城區) - 漢語蘭銀官話	kən ⁵³	S[PO]VO	A&B	F077	有生名詞
青海西寧 - 漢語中原官話	tai ²¹³	S[PO]VO	A&B	F095	所有名詞 (僅限主語)
青海西寧 - 漢語中原官話	lia ⁵³	S[OP]VO	AB&	F095	所有名詞 (僅限主語)
甘肅隴南市武都區 - 漢語中原官話	liã ³⁵ (ke ³³)	S[PO]VO	A&B	M038	所有名詞
青海西寧 - 漢語中原官話	lia ⁴⁴ ko ⁰	S[PO]VO	A&B	M017	有生名詞

⁸ 本文所有伴隨標記及並列連詞均使用寬式記音標出。

⁹ 本文所有並列結構均以 A 和 B 代表並列項，& 代表連詞。例如漢語“我和你”，會以 A&B 標示。

¹⁰ 本文所有一手語料均會列出發音人代號，格式為 M 或 F 加上三位數字編號。例如 F102、M010 等。

甘肅西峰 - 漢語中原官話	lien ³⁵	S[PO]VO	A&B	M023	有生名詞
甘肅定西 - 漢語中原官話	liẽ ³³	S[PO]VO	A&B	M033	所有名詞
甘肅慶陽 - 漢語中原官話	kɿn ⁴⁴¹	S[PO]VO	A&B	M034	有生名詞
甘肅會寧土山峴鄉蘇堡村陳原社 - 漢語中原官話	kɿn ²¹	S[PO]VO	A&B	M043	有生名詞
甘肅定西 - 漢語中原官話	lɛ ²¹	S[PO]VO	A&B	M045	所有名詞
甘肅蘭州（寧夏回民） - 漢語蘭銀官話 ¹¹	lia ³³	S[OP]VO	AB&	F234 / M096	所有名詞
甘肅白銀 - 漢語蘭銀官話	lia ³⁴	S[OP]VO	AB&	F235 / M097	所有名詞
甘肅民勤 - 漢語蘭銀官話	lia ²¹²	S[OP]VO	AB&	F236 / M098	所有名詞
甘肅臨夏 - 漢語中原官話	lia ⁴⁴³	S[OP]VO	AB&	F238 / M100	所有名詞
甘肅敦煌（河西） - 漢語蘭銀官話	lia ⁴³	S[OP]VO	AB&	F239 / M101	有生名詞

3.3. 絲路沿線語言的“共同受事標記”

本節介紹於絲綢之路語料中，由“共同受事標記”語法化而來的並列連詞。這些語言的語序皆為 S[OP]OV，即主語位於句首，而賓語和介詞短語則位於動詞之前。相應的並列結構只有 [A&B] 一種。雖然介詞短語與主語及直接賓語在線性語序上相鄰，但從並列結構的語序特點來看，我們可以推斷，這些語言的語法化過程是在 [介詞短語 + 直接賓語] 的結構中發生的。以下列舉三項證據支持上述推論：（一）韻律證據。在泰盧固語、Sadri 語、信德語和維吾爾語的調查中，發音人表示使用並列結構時，[A&B] 可以在連接詞後停頓，顯示連接詞與前置名詞在韻律上關係更為密切。雖然烏茲別克語的相關韻律結構在過往文獻中缺乏記載，而 Khadia 語的受訪者明確表示，在並列結構 [A&B] 中無法停頓，但是目前沒有找到可以在前置名詞與居中連詞之間停頓的情況。（二）語義證據。所有由共同受事標記語法化而來的連詞均遵循“無生名詞 >

¹¹ 在 2023–24 年間，我們在蘭州收集了四位回民的語料。他們都是由寧夏遷居至蘭州工作的，提供的語料與蘭州本地人有別。因此本文將其語料標記為“蘭州（寧夏回民）”。

有生名詞”的蘊含關係。換言之，如果該連接詞能夠連接有生名詞，則必然也能連接無生名詞，反之則不然。例如，泰盧固語的 *tho* ⁵⁶，按傳統的分析，*tho* 兼有伴隨介詞及並列連詞功能。但是，我們在田野調查中卻發現 *tho* 無法引介共同施事者，作並列連詞時亦只能連接無生名詞，排斥有生名詞。因此（21）合法而（22）、（23）不合法：

- (21) Naaku paalu tho, coffee kaavalu.
我 牛奶 THO 咖啡 要
(我要牛奶和咖啡。/我要加了牛奶的咖啡。)
- (22) *John tho Peter iddaru manchivaare.
約翰 THO 彼得 都 好
(*約翰和彼得都很好。)
- (23) *John Peter tho Mary ki sahayam-chesadu.
約翰 彼得 THO 瑪麗 對 幫忙
(*約翰和彼得幫助瑪麗。/*約翰幫助瑪麗和彼得。)

注意例句（23）中，如果將 *tho* 解讀為共同施事標記，句義便是“約翰和彼得幫助瑪麗”；如果 *tho* 解讀為並列連詞，句義便是“約翰幫助瑪麗和彼得”。然而，發音人表示，無論採取何種解讀，（23）都不合法。當然，我們也發現有高度語法化的共同受事標記，可以連接所有名詞。（三）語法證據。在收集到的絲路語料中，尚未發現任何由共同受事標記語法化而來的連詞能夠構成 [AB&] 的並列結構。上述證據表明，儘管這些語言的語序為 S[OP]OV，但並列連詞的語法化并非源於主語與介詞短語的鄰接，而是源於 [介詞短語 + 直接賓語] 結構的內部發展。

絲路沿線語言中有 7 個兼作並列連詞的共同受事標記，詳列如下：

表 5 絲路語言中的共同受事標記

語言	伴隨 - 並列標記	主要語序	並列結構	參考來源	可連接成分
泰盧固語	<i>tho</i> ⁵⁶	S[OP]OV	A&B	M053; F193	無生名詞
Sadri 語	<i>ao</i>	S[OP]OV	A&B	F056	所有名詞
信德語	<i>kaghad</i>	S[OP]OV	A&B	F209	所有名詞
僧伽羅語	<i>saha</i>	S[OP]OV	A&B	Siriwardena (2001); Stassen (2008)	所有名詞
烏茲別克語	<i>bilen</i>	S[OP]OV	A&B	Stassen (2008); Azimova (2010)	所有名詞
維吾爾語	<i>bilen</i>	S[OP]OV	A&B	F055	所有名詞
Khadia 語	<i>ro</i>	S[OP]OV	A&B	F056	所有名詞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絲路語言的共同施事標記與共同受事標記可能同形。然而，這種情況並不會影響本文的論述，因為本研究目前尚未發現只具備“共同施事標記”與“無生名詞並列”功能，或只具備“共同受事標記”與“有生名詞並列”功能的情況。

4. “以一為和型”及“以二為和型”語言

4.1. “罕見”的“以二為和”現象

Heine 和 Kuteva (2012) 指出，某些語言使用相同的形式來表達數詞“二”（或雙數標記）和並列連詞的功能。例如，Aranda 語中的 *tara* ‘二’同時也作為並列連詞連接兩個名詞短語。“以二為和”的現象往往被認為是“偶然的例子”（Stassen 2000: 16），因此未有進行深入研究。然而，本研究的數據庫發現，這種多義現象並不像先前學者所聲稱的那樣罕見。

陳健榮 (2020, 2022) 留意到“以二為和”的現象在藏緬語系語言中普遍存在，例如尼泊爾的 Limbu 語、緬甸的 Hahka 語。在中國境內，四川的扎壩語、普米語和涼山彝語；貴州的畢節彝語；雲南的納西語、獨龍語和柔若語；西藏的嘉絨語等，都能找到平行例子。而在 3.1 節討論到的湖南西部土家語 /ɲie⁵⁵/，亦兼有數詞“二”及並列連詞功能（見例句（13）（14））。

4.2. 絲路上的“以二為和型”語言

在絲綢之路語料中，我們也發現了並列連詞與數詞“二”同形的現象。為方便行文，本文將之稱為“以二為和型”語言。¹² 這些語言主要可以歸納為兩大類別：第一類是蒙古語族。例如保安語、土族語、東鄉語等的並列連詞都與蒙古語的數詞 *gua*（數詞“二”）相關：

表 6 蒙古語族的“以二為和”現象

語言	參考來源	形式	功能
蒙古語	Poppe (1954)	<i>qoyar</i>	數詞“二”、並列連詞
土族語	Slater (2003)	<i>ghu.la</i>	數詞“二”、並列連詞
東鄉語	Kim (2003)	<i>guala</i>	數詞“二”、伴隨格標記、並列連詞

¹² 本文對“以二為和”採取較寬鬆的定義，只要連詞由數詞“二 / 兩”組成便可納入其中。例如甘肅、青海地區漢語方言的並列連詞與數量詞“兩個”同形，亦可視作“以二為和”。

保安語	Wu (2003); Fried (2010)	<i>guar/galə</i> ; <i>ɤala</i>	數詞“二”、伴隨格標記、並列連詞 (僅能連接有生名詞) ¹³
康家語	斯欽朝克圖 (1999)	<i>gala</i>	數詞“二”、伴隨格標記

第二類是漢語方言的“倆/兩個”。值得注意的是，漢語的情況較為特殊。陳健榮 (2020, 2022) 指出，在漢語方言中，“倆/兩個”基本上都能用作同位語（例如：“張三李四倆去上海”）。凡是出現“倆/兩個”作介詞或連詞的現象，“倆/兩個”便必然兼具“一起”義副詞¹⁴的功能。以下先列出前人文獻的記錄：

表 7 甘青地區“以二為和”現象（二手材料）

語言 / 方言（參考來源）	形式	語序 ¹⁵	功能 ¹⁶		
			同位語	伴隨	有生並列
臨夏漢語 (Peyraube 2017)	<i>liangge</i>	S[OP]V	Y	Y	-
甘溝漢語 (Peyraube 2017)	<i>lia(r)</i>	S[OP]V	-	Y	-
五屯漢語 (Xu 2017; Peyraube 2017)	<i>liangge</i>	S[OP]V	Y	-	-
西寧漢語 (任碧生 2006; 都興宙 1995; 張成材編 1994)	/lia ⁰ /	S[OP]V / AB&	Y	Y	Y
經堂語 (敏春芳 2014)	兩個	S[OP]V / AB&	Y	Y	Y

吳福祥、金小棟 (2021: 371) 亦留意到甘青方言中“兩個”和“倆”具有“伴隨、工具”及“並列”功能。王雙成 (2020: 25) 發現西寧等五地方言 *lia* 有伴隨、工具格標記但無並列功能，僅五屯“兩個”/liangə/ 作該雙音節標記。前人僅證實甘青有虛化的“兩個”，卻未明其為伴隨標記還是並列連詞，故 2024–25 年赴該地田野調查，以句法特徵作二者判斷標準。席元麟 (2000: 253) 則認為五屯的“兩個”具有並列連詞功能（例如：/ni ŋo liangkə/ “我與你”）。從前人研究可見，甘青地區確實存在虛化的“兩個”，但未能確定是伴隨標記還是並列連詞。因此，我們在 2024–25 年間到甘青地區進行田野調查，以句法特徵作為伴隨及並列的判斷標準。¹⁷ 以下是我們的一手語料：

¹³ 在絲路上的“以二為和”語言中，未有找到只能連接無生名詞的情況。唯本文篇幅有限，只能留待另文詳述。

¹⁴ 注意“兩個”與典型的副詞略有差別，“兩個”前面的主語必須出現。

¹⁵ 如原文有提及並列結構語序，此處亦會一併列出。

¹⁶ 如文獻有提及相關功能，則標為“Y”；如沒有提及則標為“-”。

¹⁷ 見本文 2.2 節。

表 8 甘青地區“以二為和”現象（一手材料）

功能 ¹⁸ 漢語方言 ¹⁹	同位語	“一起”義 副詞	共同 施事	有生 並列	無生 並列	動詞 並列 ²⁰
甘肅會寧、蘭州；寧夏靈武；陝西西安	Y	N	N	N	N	N
陝西寶雞、山西臨汾	Y	Y	N	N	N	N
甘肅天水	Y	Y	Y	N	N	N
青海西寧 -1 ²¹	Y	Y	Y	Y	N	N
甘肅武都、定西、白銀、蘭州（寧夏回民），青海西寧 -2	Y	Y	Y	Y	Y	N
甘肅臨夏、民勤	Y	Y	Y	Y	Y	Y

根據上表，我們可以得出適用於所有漢語方言“兩個”的蘊含序列（implicational sequence）：

同位語 > “一起”義副詞 > 共同施事標記 > 有生並列 > 無生並列 > 動詞並列

方言中“兩個”若具某功能 X，則必兼具 X 左方所有功能，反之則否。如甘肅天水“倆”可作共同施事標記，故兼副詞、同位語功能，卻無並列連詞功能。絲路漢語方言的“以二為和”與蒙古語相關，據陳健榮（2022）分析，此現象為內外合力結果：內部“兩個”需先獲副詞功能方能進一步虛化，外部需與蒙古語接觸，才會觸發語法化並獲共同施事標記、並列連詞功能。

4.3. 絲路上的“以一為和型”語言

除了“以二為和”的語言外，絲綢之路語料中還存在一類特殊的語言，它們的並列連詞與數詞“一”同形。為方便行文，本文將之稱為“以一為和型”語言。²² 以下是我們收集到的例子：

¹⁸ “Y”表示該方言的“兩個”具有相關功能；“N”表示該方言的“兩個”並不具有相關功能。
¹⁹ 受篇幅所限，此處僅列出絲路沿線的漢語方言。
²⁰ “動詞並列”專指能夠連接兩個述賓結構的連詞。
²¹ 我們在西寧調查時，有部分發音人認為“倆”不可連接無生名詞，另一部分則認為“倆”可以連接所有名詞。此處將前者標為“西寧-1”，後者標為“西寧-2”。
²² 本文對“以一為和”採取較寬鬆的定義，只要連詞由數詞“一”組成便可納入其中。以喬治亞語為例：-dan ertad 是由工具格後綴 -t、後置語綴 gan、數詞 erti ‘一’及副詞標記 -ad 所組成，亦會視作“以一為和”。

表 9 絲路語言的“以一為和”現象

語言	參考來源	語序	形式	功能
喬治亞語	Corbett (2000); Stolz et al. (2009)	SV[OP]	-dan ertad	數詞“一”、伴隨標記
烏茲別克語	Stassen (2008); Azimova (2010); Drellishak (2004)	S[OP]OV；（並列結構：A&B）	bilan	數詞“一”、伴隨標記、並列連詞（連接名詞）
維吾爾語	易坤琇、高士傑編著（1998）；Dwyer（1992）；趙相如、朱志寧編著（1985）；F075	S[OP]OV；（並列結構：A&B）	bilen	數詞“一”、伴隨標記、並列連詞
撒拉語	Dwyer (1992)	S[OP]OV；（並列結構：A&B）	bil	數詞“一”、伴隨標記

從上表可見，大部分“以一為和”的語言都與 OV 語序的突厥語族有關，它們的並列連詞大多與 *bil* 的形式相近。其成因和分布還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4.4. 小結

絲路上“以一為和”及“以二為和”現象的分布考察絲綢之路語言，可清晰見“以一為和”（水滴形圖標）“以二為和”（“2”字圓形圖標 ）的地域分布規律：絲路東段以蒙古語族、漢語為代表呈“以二為和”，西段突厥語族為代表呈“以一為和”。蒙、突厥語族的該現象具全面性，漢語則有地域限制，僅絲路東段甘青地區及湘鄂西部有之（參考陳健榮 2020, 2022 的討論）。漢語“以二為和”還有兩項獨有必要條件：第一，“兩個”須具“一起”義副詞功能；第二，語法化的是量詞“兩個”或其合音“倆”，非數詞“二”。²³ 此條件並不適用於其他語言。²⁴

圖 4 “以一為和”型與“以二為和”型語言分布（Google n.d.）



²³ 很可能是“兩個”先合音，然後才進一步語法化。感謝匿名審稿人的提醒。

²⁴ 例如土家語雖然有量詞系統，但也是使用數詞 *nie* 作伴隨和並列，而不是數量詞 *nie hu*。

5. 餘論

本文以絲綢之路沿線語言為考察對象，系統探討了並列連詞的語法化來源與類型，揭示了此一語法範疇所蘊含的豐富多樣性與跨語言規律。主要發現可歸納為兩點：第一，絲路語言中存在源於“共同施事標記”及“共同受事標記”的兩類並列連詞，其分布與句法表現與“鄰接假說”（Chan 2020）的預測高度吻合，再次凸顯了表層句法結構在[伴隨 > 並列]語法化路徑中的決定性作用。第二，絲路語言中“以一為和”及“以二為和”兩類由數詞語法化而成的並列連詞。此發現不僅挑戰了以往學界視“以二為和”為偶發現象的觀點，更首次將“以一為和”納入類型學視野，為並列連詞的來源研究開闢了新的方向。

本研究初步探討了絲綢之路沿線語言並列連詞的多樣性，然仍有諸多問題有待深入：例如“以一為和”和“以二為和”語言中，數詞“一/二”語法化的具體路徑、機制及動因；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擴大調查範圍，涵蓋陸上及海上絲綢之路乃至“一帶一路”更廣闊區域的語言。唯有納入更廣泛的語言樣本，方能檢驗本文結論的普適性，並在跨語系比較中提煉更具普遍性的語言共性與個性。此外，語言與社會文化的互動關係亦值得關注，例如伊斯蘭文化對中亞地區並列連詞的影響，或蒙古語對甘青地區漢語方言的接觸性演變等。絲綢之路語言帶作為歷史文化交匯的廊道，實為蘊藏豐富語言現象的天然實驗室，對其持續發掘，必將為語言類型學及歷史語言學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鳴謝

本文部分內容摘自第一作者之博士論文（Chan, K.W.K. 2020. *The coordinating conjunctions in Sinitic languages and beyond: Towards a new typology*.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第五章及第七章。本研究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年度項目（25XYY030）、香港特區政府研究資助局項目（GRF641913）以及香港樹仁大學研究資助項目（URG/25/03）資助。衷心感謝范曉蕾、黃高飛、李旭平、王彩豫、張欣、周晨磊等協助搜集方言語料，亦感謝張敏教授、吳福祥教授、姚玉敏教授、孫景濤教授提供修改建議。本文初稿曾於“絲綢之路語言學國際研討會”（香港中文大學，2024年5月30–31日）上宣讀，並得曹茜蕾教授等與會者惠賜意見。其後又得《中國語文通訊》審稿專家提出修改建議，在此一併致謝！文中錯漏概由筆者負責。

參考文獻

- 陳健榮。2008。論香港粵語介詞/連詞+“埋”的形態。中國語文研究 2。59–71。Kin Wing Kevin Chan. 2008. Lun Xianggang Yueyu jieci / lianci + “mai” de xingtai. *Zhongguo Yuwen Yanjiu* 2. 59–71.
- 陳健榮。2018。論並列連詞語法化的條件。當代語言學 20(1)。40–60。Kin Wing Kevin Chan. 2018. Lun binglie lianci yufahua de tiaojian. *Dangdai Yuyanxue* 20(1). 40–60.

- 陳健榮。2020。漢語方言介連詞“兩個”的產生。當代語言學 22(1)。17–48。Kin Wing Kevin Chan. 2020. Hanyu fangyan jielianci “liangge” de chansheng. *Dangdai Yuyanxue* 22(1). 17–48.
- 陳健榮。2022。從語言接觸的視角解釋漢語方言介連詞“兩個”的語法化。語言學論叢（第六十五輯）。58–84。Kin Wing Kevin Chan. 2022. Cong yuyan jiechu de shijiao jieshi Hanyu fangyan jielianci “liangge” de yufahua. *Yuyanxue Luncong*, diliushiwu ji. 58–84.
- 陳健榮、向華武。2022。龍山土家語的並列連詞 *nie* 與 *taxa*。民族語文 2。11–23。Kin Wing Kevin Chan & Huawu Xiang. 2022. Longshan Tujia yu de binglie lianci *nie* yu *taxa*. *Minzu Yuwen* 2. 11–23.
- 都興宙。1995。論西寧話裡的虛詞 *lia*。青海民族學院學報 1。56–61。Xingzhou Du. 1995. Lun Xininghua li de xuci *lia*. *Qinghai Minzu Xueyuan Xuebao* 1. 56–61.
- Heine, Bernd & Tania Kuteva. 2012。語法化的世界詞庫。龍海平、谷峰、肖小平（譯），洪波、谷峰（注釋）。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Bernd Heine & Tania Kuteva. 2002. *Yufahua de Shijie Ciku*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trans. by Haiping Long, Feng Gu & Xiaoping Xiao, annot. by Bo Hong & Feng Gu. Beijing: Shijie Tushu Chubanshe.
- 黃布凡、周發成。2006。羌語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Bufan Huang & Facheng Zhou. 2006. *Qiangyu Yanjiu*. Chengdu: Sichuan Renmin Chubanshe.
- 林濤。2007。東干語論稿。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Tao Lin. 2007. *Dongganyu Lungao*. Yinchuan: Ningxia Renmin Chubanshe.
- 劉丹青。2003。語序類型學與介詞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Danqing Liu. 2003. *Yuxu Leixingxue yu Jieci Lilu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敏春芳。2014。“經堂語”的格標記和從句標記。方言 3。242–252。Chunfang Min. 2014. “Jingtangyu” de ge biaoji he congju biaoji. *Fangyan* 3. 242–252.
- 任碧生。2006。青海方言語法專題研究。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Bisheng Ren. 2006. *Qinghai Fangyan Yufa Zhuanti Yanjiu*. Xining: Qinghai Renmin Chubanshe.
- 石定栩、韓巍峰。2013。繫詞的語法化過程與趨勢。漢語學習 5。3–12。Dingxu Shi & Weifeng Han. 2013. Xici de yufahua guocheng yu qushi. *Hanyu Xuexi* 5. 3–12.
- 斯欽朝克圖。1999。康家語研究。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Sechenchogt. 1999. *Kangjiayu Yanjiu*. Shanghai: Shanghai Yuandong Chubanshe.
- 孫宏開。1981。羌語簡志。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Hongkai Sun. 1981. *Qiangyu Jianzhi*. Beijing: Zhongyang Minzu Daxue Chubanshe.
- 王雙成。2020。語言接觸與西寧方言的並列和伴隨——兼論伴隨和工具格標記“倆”的來源。民族語文 3。20–29。Shuangcheng Wang. 2020. Yuyan jiechu yu Xining fangyan de binglie he bansui: Jianlun bansui he gongju ge biaoji “lia” de lai yuan. *Minzu Yuwen* 3. 20–29.
- 吳福祥。2003。漢語伴隨介詞語法化的類型學研究——兼論 SVO 型語言中伴隨介詞的兩種演化模式。中國語文 1。43–58, 96。Fuxiang Wu. 2003. Hanyu bansui jieci yufahua de leixingxue yanjiu: Jianlun SVO xing yuyan zhong bansui jieci de liangzhong yanhua moshi. *Zhongguo Yuwen* 1. 43–58, 96.
- 吳福祥、金小棟。2021。甘青方言若干附置詞“伴隨 - 工具 - 方所”多功能模式的來源。中國語文 3。365–381, 384。Fuxiang Wu & Xiaodong Jin. 2021. Gan-Qing fangyan ruogan fuzhici “bansui-gongju-fangsuo” duogongneng moshi de lai yuan. *Zhongguo Yuwen* 3. 365–381, 384.
- 席元麟。2000。同仁土族（五屯）語言調查報告。見青海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編），民族研究叢刊，青海民族研究（第二輯），229–266。青海：青海民族學院。Yuanlin Xi. 2000. Tongren

- Tuzu (Wutun) yuyan diaocha baogao. In Qinghai Minzu Xueyuan Minzu Yanjiusuo (ed.), *Minzu Yanjiu Congkan: Qinghai Minzu Yanjiu*, di'er ji, 229–266. Qinghai: Qinghai Minzu Xueyuan.
- 楊萌萌、胡建華。2017。何以並列？——跨語言視角下的漢語並列難題。外語教學與研究 49(5)。719–731, 800。Mengmeng Yang & Jianhua Hu. 2017. Heyi binglie? Kua yuyan shijiao xia de Hanyu binglie nanti.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49(5). 719–731, 800.
- 楊萌萌、胡建華。2018。“和”的句法。語言教學與研究 3。58–70。Mengmeng Yang & Jianhua Hu. 2018. “He” de jufa.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3. 58–70.
- 易坤琇、高士傑（編著）。1998。維吾爾語語法。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Kunxiu Yi & Shijie Gao (eds.). 1998. *Weiwu'eryu Yufa*. Beijing: Zhongyang Minzu Daxue Chubanshe.
- 張成材（編）。1994。西寧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Chengcai Zhang (ed.). 1994. *Xining Fangyan Cidian*. Nanjing: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
- 張敏。2015。“語義地圖模型”：原理、操作及在漢語多功能語法形式研究中的運用。見李小凡、張敏、郭銳等，漢語多功能語法形式的語義地圖研究，3–54。北京：商務印書館。Min Zhang. 2015. “Yuyi ditu moxing”: Yuanli, caozuo ji zai Hanyu duogongneng yufa xingshi yanjiu zhong de yunyong. In Xiaofan Li, Min Zhang, Rui Guo et al., *Hanyu Duogongneng Yufa Xingshi de Yuyi Ditu Yanjiu*, 3–54.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趙相如、朱志寧（編著）。1985。維吾爾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Xiangru Zhao & Zhining Zhu (eds.). 1985. *Weiwu'eryu Jianzhi*.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 Azimova, Nigora. 2010. *Uzbek: An elementary textbook*.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Chan, Kin Wing Kevin. 2020. *The coordinating conjunctions in Sinitic languages and beyond: Towards a new typology*.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ssertation.
- Chomsky, Noam. 1957. *Syntactic structure*. The Hague: Mouton.
- Chomsky, Noam. 1969.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In Sidney Hook (ed.), *Language and philosophy: A symposium*, 51–94.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Corbett, Greville G. 2000. *Number* (Cambridge Textbooks in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k, Simon C. 1968. *Coordination: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theory of general linguistic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 Drellishak, Scott. 2004. *A survey of coordination in the world's languag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MA thesis.
- Dryer, Matthew S. & Martin Haspelmath.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online (WALS)*. Leipzig: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http://wals.info> (accessed 16 March 2026).
- Dwyer, Arienne M. 1992. Altaic elements in the Linxia dialect: Contact-induced change on the Yellow-River Plateau.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0(1). 160–178.
- Fried, Robert Wayne. 2010. *A grammar of Bao'an Tu, a Mongolic language of northwest China*.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dissertation.
- Google. n.d. Map of the world with connotation added with Google MyMap. https://www.google.com/maps/d/u/0/edit?hl=zh-TW&mid=1MTQbI_oGtDe9Qp3_HrOLdF_QsIG-wPvI&ll=6.13559001148019%2C0&z=2 (accessed 23 January 2026).
- Haspelmath, Martin (ed.). 2004. *Coordinating construction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Haspelmath, Martin. 2007. Coordination. In Timothy Shopen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linguistic description*, 2nd edn., 1–5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spelmath, Martin. 2016. The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Comparative concept and cross-linguistic generalization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7. 291–319.
- Hopper, Paul J. 1991. On som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ization. In Elizabeth C. Traugott & Bernd Heine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18–35.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Kim, Stephen S. 2003. Santa. In Juha Janhunen (ed.), *The Mongolic languages*, 346–363.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Matthews, Stephen & Virginia Yip. 1994. *Cantonese: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London: Routledge.
- Mithun, Marianne. 1988.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coordination. In John Haiman & Sandra A. Thompson (eds.), *Clause combining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331–359.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Munn, Alan. 1987. Coordinate structure and X-bar theory. *McGill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4. 121–140.
- Peyraube, Alain. 2017. The case system in three Sinitic languages of the Qinghai-Gansu linguistic area. In Xu Dan & Hui Li (eds.), *Language and genes in Northwestern China and adjacent regions*, 121–139.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 Poppe, Nicholas. 1954. *Grammar of written Mongolian* (Porta Linguarum Orientalium, Neue Serie, 1). Wiesbaden: Harrassowitz.
- Ross, John Robert. 1967. *Constraints on variables in syntax*. Cambridge, MA: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issertation.
- Siriwardena, Bodhipriya Subadra. 2001. *Practical Sinhala for beginners*. Colombo: Piyasiri Printing Systems.
- Skirgård, Hedvig, Hannah J. Haynie, Harald Hammarström, et al. 2023. *Grambank v1.0* [Data set]. Zenodo. <https://doi.org/10.5281/zenodo.7740140> (accessed 16 March 2026).
- Slater, Keith W. 2003. *A grammar of Mangghuer: A Mongolic language of China's Qinghai-Gansu sprachbun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 Stassen, Leon. 2000. AND-languages and WITH-languages. *Linguistic Typology* 4. 1–54.
- Stassen, Leon. 2008. Noun phrase conjunction: The coordinative and the comitative strategy. In Frans Plank (ed.), *Noun phrase structure in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761–817.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Stolz, Thomas, Cornelia Stroh & Aina Urdze. 2009. Varieties of comitative. In Andrej Malchukov & Andrew Spenc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ase*, 601–608.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1986. On the origins of “and” and “but” connectives in English. *Studies in Language* 10. 137–150.
- Wu, Hugjiltu. 2003. Bonan. In Juha Janhunen (ed.), *The Mongolic languages*, 325–345.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Xu, Dan. 2017. *The Tangwang language: An interdisciplinary case study in Northwest China*. Switzerland: Springer.

- Zhang, Niina. 2006. On the configuration issue of coordinati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7(1). 175–223.
- Zwart, Jan-Wouter. 2005. Some notes on coordination in head-final languages. In Jenny Doetjes & Jeroen van de Weijer (eds.), *Linguistics in the Netherlands*, 232–24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Typological Study of Coordinating Conjunctions in Silk Road Languages

Kin Wing Kevin Chan and Chenxuan Li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issue of how lexical words become coordinating conjunctions through grammaticalization has always interested scholars in linguistic typology, and, in recent years, many have examined the universal patterns of conjunction grammaticalization using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s. This study is based on fieldwork from 2010 to 2025 and covers 1,533 coordinating conjunctions drawn from 426 languages and 367 Chinese dialects along the Silk Road, aiming to analyze their grammatical features and grammaticalization pathways. Two main findings are reported. (1)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ways of coordinating conjunctions in Silk Road languages can be divided into “co-agent type” – which tends to link animate nouns – and “co-patient type” – which tends to combine inanimate nouns. (2) Many conjunctions in these languages are homophonous with numerals, leading to two subtypes: one where “and” corresponds to the numeral “one” (such as Georgian *-dan ertad*, Uyghur *bilan*), and the other where “and” aligns with the numeral “two” (such as Dongxiang *guala* in Gansu and Qinghai, and *lia*, *liangge* in some Mandarin dialects of the area). This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e diversity of conjunctions in Silk Road languages, supplying important data and fresh insight for typological studies.

Keywords

coordinating conjunction, co-agent, co-patient, typology, grammaticalization

通訊地址：香港 北角 香港樹仁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

電郵地址：kwchan@hksyu.edu (陳健榮)

nicole19940412@gmail.com (李晨萱)

收到稿件日期：2024年8月26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5年12月30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6年1月26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6年1月27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4月30日